

評介日文版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

丁文江、趙豐田編，島田虔次編譯，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
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04。5卷。

張朋園・黃克武*

丁文江、趙豐田編輯的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（以下簡稱《梁譜》）現在有三種版本，兩個中文本，一個日文本。本文擬向中文學界介紹由已故京都大學島田虔次(1917-2000)教授規劃、主持，狹間直樹、井波陵一等人所參與編譯的日文版本。本文不討論瑣碎的日文翻譯問題，而將焦點放在《梁譜》的緣起，與此一譯作成書的經過及其優點，以及對中文學界從事梁啟超研究的參考價值。

談到日文版的《梁譜》之前，要先回頭看看兩個中文本。1929年，梁啟超過世之後，丁文江有心要為梁氏寫一部傳記。為了蒐集資料，他與梁家商定，向任公的親友徵求書札。當時由任公的子女梁思成、梁思順署名登報，並由丁文江與梁思成親自發函，向各界徵集資料。此一呼籲獲得了熱烈的響應，他們收到一萬多封任公生前寫給親友的信函，和許多時人對任公的回憶，這就是《梁譜》的基本資料。丁文江是個忙人，他邀請當時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就讀的年輕歷史學者趙豐田協助整理。但不幸的是，六年後（1936年1月）

* 張朋園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，黃克武為同所副研究員。本文由張朋園完成初稿、擬定基本架構，再由黃克武增補而成篇。作者感謝汪榮祖教授的多方協助。

丁文江過世前並沒有寫成有關任公的傳記，僅完成了一部由丁、趙二人合作編成的年譜長編初稿。「初稿本」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，是以毛筆寫在 20x10 的中式直排的稿紙之上，稿紙左邊下緣印有「梁任公先生年譜稿紙」的字樣，上緣則有四位數字的頁碼。該稿有不少修改、編輯的痕跡，還有一些浮貼的紙條。

年譜初稿完成之後，編者又請人重新謄寫，再用鋼板蠟紙刻寫而後油印。一共印了 50 部，分送給任公家屬與較為接近的朋友，徵求他們的意見，有幾個大圖書館也收到一份，作為藏品。北京圖書館將此本收入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出版社，1998），冊 193-196。該書題為：丁文江、趙豐田編，民國二十五年油印本，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。民國年間，由於政局不安，使年譜無法出版。1949 年之後，《梁譜》的「初稿本」隨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播遷來到台灣，在胡適、丁文淵（丁文江之弟）等策劃之下，於 1958 年由台灣世界書局鉛印問世。這是第一個版本，該書題為丁文江先生編，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58）；卷首有胡適寫的一個序，說明出版原委。此世界書局版約 70 萬字，以 9 號字 28 開本排印，一共 787 頁，眼力不好的人讀起來十分吃力。此版最大的缺點是內容有所改動，原因是梁任公生前寫的許多書信對國民黨及該黨人物有所批評之故。世界書局在威權政治下，怕受牽累，招惹禍事，因此加以某些改動和刪節。例如，提及蔣介石時加上「先生」二字，「蔣軍」改為「北伐軍」。刪節比較多而明顯的是民國 15 年，約數百字，16 年約千餘字。詳見吳銘能，〈台北世界書局版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校勘記〉，《梁啟超研究叢稿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2001），頁 329-375。

1949 年之後，此一書稿在中國大陸一直沒有出版，直到 1978 年，當時任職於河南省歷史研究所的趙豐田才應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約，重拾《梁譜》的編纂工作。1983 年，他將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簡體字 25 開本，共計 1,212 頁。趙豐田在前言中表示，簡體字本「保持原書的

風貌」，增補的是「解放後發現的信札」，為數不多。特色是那些對孫中山、中國共產黨的「誣蔑之詞……均保持原貌」，沒有台灣世界書局本的缺失。然而趙豐田也承認：「一則因為許多信札原稿已經散佚；二則信札中用的代號隱語很多。所以不可能作全面詳盡地校勘和註釋，有些只好留待以後再行補正了。」〔趙豐田，〈前言〉，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1-6〕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本子，無疑地要比台灣世界書局的本子好得多，不但保留了因為政治忌諱而刪去的句子，在校對上也更為精審，還加上一部份的註釋。日譯本即以此為準，是很正確的選擇。

本文的兩位作者，在從事梁啟超研究的過程中均得益于《梁譜》。張朋園最早受到郭廷以的鼓勵，開始閱讀《梁譜》。他在1960-80年代所使用的本子是世界書局本。《梁啟超與清季革命》、《立憲派與辛亥革命》、《梁啟超與民國政治》三書均參考此一版本。他當時也知道此一版本因受政治因素影響，有所刪節，故曾去史語所借閱「初版本」來核對。1984年，余英時送他一本趙豐田編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的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，他才開始接觸到簡體字本〔張朋園口述，並參見黃克武，〈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〉，《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口述歷史叢書（84），2004）〕。

《梁譜》是研究近代溫和型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史料，在國內外都受到重視。在國外較早發現《梁譜》價值的是日本學者。說得更準確一點，是日本的關西學派。京都大學有一個研究會，在狹間直樹教授的領導下，於1993-1997年間，研究梁啟超通過日本認識西方的過程和內涵，並於1999年之後，先後以日文、中文和英文出版其研究成果，肯定「梁啟超是中國傳統文化轉向現代化的推動者」〔閻狹間直樹編，《共同研究梁啟超：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》（東京：みすず書房，1999）；狹間直樹編，《梁啟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1）。中文書評見桑兵，〈梁啟超的東學、西學與新學——評狹間直樹《梁啟超·明治日本·

西方》〉，《歷史研究》，2002年第6期，頁160-166。英文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可參閱 Joshua A. Fogel, ed., *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'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* (Berkeley: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2004)】。

狹間直樹在籌組這個集體研究時，由於時空的機緣，使他們能夠一方面研究梁啟超，另一方面翻譯《梁譜》。此與他們的老師輩學者島田虔次有密切的關係。島田虔次是一位博學的漢學家，他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，對朱熹、王陽明、熊十力等均有專書出版。他同時也研究晚清變法和辛亥革命，有關島田先生學術貢獻的中文簡介與著作目錄，可參閱森紀子，〈島田虔次〉，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》，期18(1994)，頁96-110。島田於1992年高齡75歲時，一時靈感引發他要系統性地介紹中國近代重要人物的年譜。他覺得陳錫祺主編的《孫中山年譜長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），和丁文江、趙豐田的《梁譜》最值得譯為日文。他與狹間直樹等學者商議結果，決定先翻譯《梁譜》。

翻譯工作於1993年展開，主要的參加者有10人：島田虔次、狹間直樹、井波陵一、森時彥、江田憲治、石川禎浩、岡本隆司、高嶋航、村上衛、早川敦，均為京都大學教職人員。此外，也有關西地區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者參與，有關人員參與及退出之細節，井波陵一在該書第五卷之〈後記〉中有清楚的交代。另可參見岡本隆司，〈丁文江、趙豐田編，島田虔次編譯『梁啟超年譜長編』〉，《東洋史研究》，卷63期1(2004)，頁132-137。他們每個人選擇一個時段，各自進行翻譯；每二週舉行一次討論會。初稿譯出後，則交島田虔次審閱。島田詳為斟酌，力求符合「信、達、雅」三大準則。翻譯工作之難，凡稍有經驗者，都能體會個中滋味。《梁譜》內容十分龐雜，最困難的是萬餘封信函中的人物與隱語，若不先求其解答，則無從著筆。幸得島田虔次以及一些前往京都大學訪問研究的中國學者，如楊天石教授等的指點，解決不少困難。

2000 年時翻譯工作已大體就緒，不幸島田先生卻於此時逝世，享年 83 歲。狹間直樹與森時彥等繼續綜合整理工作，完成殺青，並於 2003 年付梓，2004 年全部出版，以 25 開本 5 大卷裝訂，合計約 2,500 頁。本文作者之一的黃克武於 2003 年底，在石川禎浩教授的邀約下，曾有幸參與過一次該翻譯計畫第三百餘次的聚會，與會之時狹間先生曾感嘆地說：「中國學者大概很難瞭解我們為什麼要從事這一項工作！」黃克武倒很了解其意義，他認為這一部書將成為未來梁啟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套工具書，也是整體呈現梁啟超與他的時代的史著，有再將之翻譯為中文的價值（黃克武，〈略論梁啟超研究的新方向〉，《文史哲》，2004 年第 4 期，頁 31-34）。

上文所謂「有再將之翻譯為中文的價值」，是因為此一翻譯工作不只是將中文轉換為日文，供日本讀者參考，更可以稱之為一部「整體呈現梁啟超與他的時代的史著」。這涉及日譯本在中文本的基礎之上，下過大量的學術功夫，其努力絕不下於一本專刊的書寫。我們可以將日譯本的特色與意義總結為以下幾點：

第一、考訂翔實。在翻譯為日文過程中，譯者對於書中內容作了翔實的考證。凡是能找得到原始出處的史料，他們都詳加核對，註明文本之差異，並改正排版上的錯誤。例如，「油印本」（頁 443）與「世界本」（頁 100）將孫寶瑄的瑄，誤植為「鎧」，「日譯本」跟隨「上海人民本」改正了此一錯誤；又如「上海人民本」頁 211，跟隨以往的版本作「副總理張君梅如」，「日譯本」則依據上下文考訂，確認此人應為興中會的「張福如」（卷 2，頁 29、385）。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。因此未來學者如引用《梁譜》，參考日文本的考訂，可以節省不少文字校正的時間。

第二、譯本對書中專有名詞、人物生平與隱語等均力求註釋與解答。譯本正文約 1,800 餘頁，註文有 430 餘頁，可知譯文講求完整，註文求其詳盡。人物註解包括生卒年代、出生籍貫、教育背景、重要事蹟等。所引資料，一點一滴，均得來不易。隱語方面或出自典籍，或源於幫會，來龍去脈，清清

楚楚。凡是舊日不能解答的困難，在譯文中幾乎都得到了答案。當然在這方面也有極少數難解之處，可再加補充，如在「譜前」之中節錄《曼殊室戊辰筆記》，提到「吾鄉有一廟宇，中藏古畫四十八幅，……寫歷史上二十四忠臣、二十四孝子之故事」。「日譯本」在卷 1，頁 23，並沒有加上註解。事實上在佳木所寫的〈梁啟超故鄉述聞〉〔原刊《廣東文史資料》，輯 12(1964)，後收入夏曉虹編，《追憶梁啟超》（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 56-59〕，對於這四十八幅畫的地點（茶坑的北帝廟）、來歷，以及與梁家的關係，均有所著墨，不過沒寫到二十四忠臣究竟指哪 24 個人。

這些註解之中，最有價值的部份大概是人物的傳記資料。尤其是書信之中，人物的名字或用名或用字號，非常混亂。日譯本則在各章中不嫌其煩地引用學界的研究成果，並詳加解釋。此外，又於一、五卷之後附加索引，有別名、筆名引本名，反過來亦可由本名引別名和筆名。再加上參考書目 1,500 餘條，幾乎囊括了近年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。比較可惜的是在人名索引上，中國人名依五十音的順序，外國人（日本人除外）是用片假名（在第一卷的「外國人名表 1」中附有外文原文與中譯名）表達，對中國讀者來說，在使用上較不方便。

第三、本書不但對於文本的文字、內容有充分的掌握，更藉此而描繪出一幅幅清晰的歷史圖像。我們可以舉有關保皇會庚子勤王運動為例。在中國學界對此課題研究得最深入者，要推廣州中山大學的桑兵教授，他對相關資料的掌握，幾乎無人能比〔參閱桑兵，《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〕。然而當他看到日譯本稿本的相關章節後表示：「人文科學研究所簽注的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顯示，他們對有關部分的破解，亦已盡人力條件之所能，不禁詫為奇事」〔桑兵，〈梁啟超的東學、西學與新學——評狹間直樹《梁啟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》〉，頁 160〕。於此亦可略見日譯本所達到的學術境界。我們也不得不佩服日本學者在翻譯工作上的一絲不苟。

總之，日譯本的貢獻在於以細密的考證功夫，解決文本內容的問題；同時能夠進一步地參考、綜合學界有關梁啟超研究的成果，將《梁譜》放在一個更清楚的歷史脈絡之中。該書呈獻給讀者的，不但是任公個人生活的點滴，也是一個複雜時代之下士人的交往圈。這樣一來，本書雖然以一部工具書的形式出現，實質上已兼具史著的價值，是未來從事梁啟超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參考書。我們認為日譯《梁譜》之間世，對梁啟超、立憲派、近代溫和型知識分子之認識，甚有幫助，而且本身成為一個研究梁啟超的推動力，將會引導出更為豐碩的研究成果。